

# 东盟职教研究简报

2023 年第 6 期（总第 23 期）

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编制

2023 年 10 月

## 中心动态

- 老挝美达教育有限公司来我校交流座谈……………2
- 我院国际学生受邀参加 2023 中国-东盟“乡村振兴之民族民间绘画技艺传承(贵州农民画)国际论坛与培训”活动……………2

## 东盟资讯

- 习近平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4
- 中国—柬埔寨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9
- 东盟留学生广西“取经”校企携手培养“订单班”国际工匠…10
- 百名老挝骨干教师抵达昆明参与培训……………12
- 举行“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机遇、未来和挑战”研讨会……12

## 国别研究

- “一带一路”倡议十年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成就与高质量发展路径……………14
-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成效与展望……………27

## 热点分析

- 周边外交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6

## ◎中心动态

### 老挝美达教育有限公司来我校交流座谈

10月19日下午，老挝美达教育有限公司培训中心主任谢贵云一行来我校交流合作洽谈。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邓振华、副院长征玉韦、护理学院护理教研室主任周建玲及国际教育学院科室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交流座谈，会议由邓振华主持。

邓振华对谢贵云一行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介绍了我院国际化办学情况及取得的主要成效，同时感谢老挝美达教育有限公司近年来对我院国际化办学的支持。邓振华表示，在取得现有成绩的同时，希望老挝美达教育有限公司能继续加强与我院的交流合作，深化双方合作项目，推进双方协同发展。

谢贵云对我院热情周到的接待和安排表示感谢。谢贵云指出，老挝美达教育有限公司长期致力于汉语培训及国际交流合作。目前公司已是老挝最大的汉语培训机构，公司将继续发挥国际化服务和资源优势，拓展双方未来合作空间。随后双方就国际师生互访、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

会后，谢贵云一行参观考察了护理学院实训室和经济与管理学院农产品营销中心。（来源：铜仁职院国际教育学院）

### 我院国际学生受邀参加 2023 中国-东盟“乡村振兴之民族民间绘画技艺传承(贵州农民画)国际论坛与培训”活动

受黔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邀请，我院五名来自加纳、埃及、

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赤道几内亚的国际学生由辅导员带队于10月20-22日参加了2023中国-东盟全年期项目“乡村振兴之民族民间绘画技艺传承(贵州农民画)国际论坛与培训”活动。本次活动以“欣赏与体验贵州农民画(苗画)之美”为主题,对促进人文交流,推动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坛上,黔南幼专副教授万道刚,贵州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何国富,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导师、教授杨洪文,分别围绕“艺术传播视角下的贵州农民画业态传承研究——以贵州平坡农民画为例”“民族民间美术的文化遗产与美术教育研究”“农民画‘热’的‘冷’思考”作主旨报告,共同深入学习探讨了解农民画,进一步增进大家对贵州农民画的了解。当天,与会人员还在黔南幼专参观农民画作品展,了解当地苗画创作手法和特点,感受农民画之美,增进文化交流。

21日与会人员到龙里县洗马镇平坡村参观了露天博物馆、平坡苗画文创中心、平坡墙画,并在平坡传习所体验民族民间绘画技艺。我院国际学生在当地文创中心的工作人员指导下也参与了农民画创作,来自加纳的国际学生亚克表示第一次看到这么有创意、有特色的绘画作品。也非常感谢组织方和学校给予参加这次活动的机会,表示自己收获很多。

此次活动的举办,增进了各国青年学子相互了解、向世界展示了贵州乡村振兴成果和贵州农民画,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让各国青年学生成为中外文明交流对话的友好使者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坚固桥梁、坚实纽带。(来源:铜仁职院国际教育学院)

## ◎东盟资讯

### 习近平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

10月18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的主旨演讲。习近平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强调中方愿同各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作出不懈努力。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他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提出这一倡议的初心，是借鉴古丝绸之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同各国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

10年来，我们坚守初心、携手同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一带一路”合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成立了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落地生根；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指导原则。10年来，我们致力于构建以经济走廊为引领，以大通道和信息高速公路为骨架，以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管网为依托，涵盖陆、海、天、网的全球互联互通网络，有效促进了各国商品、

资金、技术、人员的大流通，推动绵亘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习近平强调，过去10年取得的成绩弥足珍贵，经验值得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只要各国有合作的愿望、协调的行动，天堑可以变通途，“陆锁国”可以变成“陆联国”，发展的洼地可以变成繁荣的高地。我们深刻认识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是共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反对单边制裁，反对经济胁迫，也反对“脱钩断链”。10年的历程证明，共建“一带一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辑，走的是人间正道。我们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和挑战，为子孙后代创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指出，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中方愿同各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作出不懈努力。

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中方将加快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办好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会同各方搭建以铁路、公路直达运输为支撑的亚欧大陆物流新通道。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加快陆海新通道、空中丝绸之路建设。

二、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方将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同更多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中方将每年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三、开展务实合作。中方将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设立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项目。中方还将实施1000个小型民生援助项目，通过“鲁班工坊”等推进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并同各方加强对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和人员安全保障。

四、促进绿色发展。中方将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大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支持，继续举办“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建设光伏产业对话交流机制和绿色低碳专家网络。落实“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到2030年为伙伴国开展10万人次培训。

五、推动科技创新。中方将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举办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未来5年把同各方共建的联合实验室扩大到100家，支持各国青年科学家来华短期工作。中方将在本届论坛上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愿同各国加强交流和对话，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

六、支持民间交往。中方将举办“良渚论坛”，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明对话。在已经成立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艺术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继续实施“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

七、建设廉洁之路。中方将会同合作伙伴发布《“一带一路”廉洁建设成效与展望》，推出《“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高级原则》，建立“一带一路”企业廉洁合规评价体系，同国际组织合作开展“一带一路”廉洁研究和培训。

八、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中方将同共建“一带一路”各国加强能源、税收、金融、绿色发展、减灾、反腐败、智库、媒体、文化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继续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成立高峰论坛秘书处。

习近平最后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让我们谨记人民期盼，勇扛历史重担，把准时代脉搏，继往开来、勇毅前行，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迎接共建“一带一路”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新发展，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智利总统博里奇，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肯尼亚总统鲁托，老挝国家主席通伦，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俄罗斯总统普京，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斯里兰卡总统维克拉马辛哈，土库曼斯坦民族领袖、人民委员会主席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柬埔寨首相洪玛奈，埃及总理马德布利，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莫桑比克总理马莱阿内，巴基斯坦总理卡卡尔，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泰国总理赛塔，尼日利亚副总统谢蒂马，阿联酋总统特别代表、哈伊马角酋长国酋长卡西米，法国总统特别代表、前总理拉法兰，希腊总理高级代表、发展部部长斯克雷卡斯等 20 多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高级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芙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

普京、托卡耶夫、佐科、费尔南德斯、阿比、古特雷斯也在开幕式致辞。（来源：东盟头条）



## 中国—柬埔寨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10月17至18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京举行，柬埔寨首相洪玛奈将赴华出席。RCEP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十年来，中国与柬埔寨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在全业态、多领域开展积极合作，成果丰硕，既为“一带一路”合作树立了样板，也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铸就了典范。

许宁宁谈到，2010年中柬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9年两国确定了《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中柬进入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近些年来，中国保持柬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投资来源国地位。今年1月至7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主要投向的前十个国家中，柬埔寨位居其中。柬埔寨发展理事会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中国在柬埔寨投资额约28.6亿美元，占柬总投资额的76.24%。其中投资最多的是基础设施、建筑业、农产品加工等领域。

中柬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成为助力柬埔寨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继去年底“金港高速”正式通车，第二条金边至巴域高速公路也于今年6月开工。暹粒吴哥国际机场项目接近完工，10月将正式通航。作为中柬“一带一路”示范项目的西港经济特区，已成功打造成国际化工业园区。

许宁宁表示，中柬经贸合作充满活力，各方对合作发展充满信心。他就当前增进中柬两国经贸合作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落实好两国领导

人和政府共识，进一步将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做细做实，执行好中柬自贸协定；二是进一步深化产业合作，加强产业规划及其政策对接，以产业合作开发经贸互补性和打造优势互补的新产业链，以产业合作带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中小企业发展；三是进一步提高投资合作水平，合作办好产业园区，两国各有关方包括地方政府和行业商协会多召开贸易推介会、投资商机对接会；四是双方企业用好自由贸易协定政策，合作开发两国市场、区域市场乃至国际市场；五是双方企业应着力提高国际经营合作水平；六是以 2024 年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深双方人文社会合作，为巩固发展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经贸合作进一步夯实社会基础。（来源：人民网）

### 东盟留学生广西“取经”校企携手培养“订单班”国际工匠

“为毕业后可以顺利进入柳工泰国分公司学习，我们前来广西留学。”泰国留学生刘伟强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留学期间收获颇丰。

21 岁的刘伟强，今年 5 月份从泰国前来广西柳州留学。他是柳州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柳职”)、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工”)与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三方合作，共同培养的“订单班”学生，成绩合格后将由柳工泰国分公司接收就业。

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交往不断深入，柳工拥有 4 个海外制造工厂、5 个全球研发中心，为 170 余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产品和服务。柳工曾参与中老铁路、中泰铁路等多个“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泰国的柳工装载机市场占有率达到 50%以上。

“随着企业与东盟合作走深，我们遇到人才培养的困难。企业‘走

出去’，但却在当地找不到专业的服务、维修人才。”柳工国际业务中心总经理李东春表示，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到“走进去”，需要与当地共同合作，为当地培养人才和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该“订单班”项目由柳工负责投入培训教学设备，提供技术支持；柳职负责职业教育标准输出，做好教师培训及学生认证；泰国正大管理学院负责场地建设，通用设备投入及教学组织与实施。

经过几个月的实地学习，刘伟强感触很深：“在中国学习可以动手实际操作，提高我们的实践能力，以便更好地融入工作。”

泰国留学生王小月表示，此前对即将步入社会工作有点担心，通过在柳工实地学习，减轻了部分就业焦虑。她说：“刚到中国留学时语言不通，中国老师、同学给予了热情友好的帮助，使我顺利完成学习，掌握技能。”

在柳职国际交流处处长韦林华看来，“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职业教育不发达，为解决中国企业“走出去”人才匮乏问题，通过多方合作定制化为柳工培养工匠人才。她说：“在柳州期间，我们为经过选拔的优秀海外学生提供中文、机械工程等课程教育，与柳工一起为他们提供柳工柳职院订单班留学生奖学金。”

除泰国订单班外，柳职还与柳工、印度尼西亚学校合作开展订单班项目。9月17日，该校迎来第一届柳工—柳职院印尼PNJ线下订单班学员。近年来，该校非常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先后与英国、德国、沙特阿拉伯、越南等18个国家与地区的高校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合作。（来源：中新社）

## 百名老挝骨干教师抵达昆明参与培训

11月5日，100名“援助老挝农村教师素质能力提升工程”第一期老挝骨干教师培训班教师团教师，乘坐老挝万象至中国昆明的3U3714航班顺利入境。

据悉，“援老挝农村教师素质能力提升工程”是由中国商务部委托上海教育出版社负责实施、云南大学具体承办的中国对老挝八大援助工程之一，旨在帮助提升老挝教育管理水平和教育工作者整体素质。上海教育出版社充分考虑云南省与老挝地缘相近的区位优势，选择云南大学作为本项目的培训基地之一，后续还将会有27期骨干教师团来到中国培训学习。

“老方希望通过此次援助将中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丰富经验，以及国际上最新的教育信息技术和知识引入老挝，帮助老挝教育与国际接轨，减少老挝城乡教育差距，推动老挝远程教育再上一个新台阶。”上海教育出版社援助老挝项目部经理张弛说。

为圆满完成此次通关服务保障任务，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掌握旅客动态，安排骨干警力，开设专门查验通道，加强服务引导，最大限度保障老挝教师团顺畅通关。（来源：中新网）

## “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机遇、未来和挑战”研讨会在马来西亚举行

11月1日，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公使郑学方出席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主办的“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机遇、未来和挑战”研讨会并致辞。马来西亚贸工部副部长刘镇东出席会议并致辞。

郑学方重点宣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表示中国积极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持续加深、伙伴关系全面提升、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愿同地区国家携手构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共生的亚洲家园。中方愿和马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马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行稳致远。

刘镇东表示，马中关系走在地区国家前列。马方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合作，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来源：东盟头条）

## ◎ 国别研究

### “一带一路”倡议十年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成就与高质量发展路径

杨体荣，段寻，吴坚

(杨体荣，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中文教师教育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段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吴坚，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摘要：**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十年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最成功的案例之一。研究依托人员、领域、治理的框架分析中国—东盟教育合作，发现学生流动的主体性地位持续强化、教师流动取得优先性和战略性地位、教育合作领域更加立体化和协同化、教育合作制度与治理体系持续优化。中国—东盟教育合作存在中国面临教育合作需求增长与外部竞争加剧、东盟各国教育现代化转型与需求收缩、渠道数字化的系统性变革等挑战。为推进中国—东盟教育合作高质量发展，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等可对接区域教育合作的新需求，推动学生流动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定位区域教育合作的新结构，打造层次多样、供给充足的教师队伍；扩展区域教育合作的新领域，建立更具韧性的教育合作体系；不断完善区域教育合作的制度，推动教育合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中国—东盟教育合作；一带一路；教育对外开放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第一个十年，中国与东盟的教育合作保持着稳定增长和持续深化的发展态势，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典型范例。分析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成就、挑战以及未来发展路径，具有丰富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以2013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教育合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成就进行学理分析，探讨其中的挑战，进而提出推动下一阶段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 一、问题提出与分析框架构建

“中国—东盟关系是东盟同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具活力、最富内涵、最为互利的关系之一”<sup>[1]</sup>，具有深刻的内涵与广阔的探究空间。教育合作是这一对话伙伴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为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正增长提供了驱动力。国内外学界对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研究可以总结为如下方面。

其一，关注教育合作中的人员流动与学校交流。人员流动包括学生流动和教师流动，指向了区域教育合作中人才联合培养这一关键问题。例如，有研究者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间的国际中文人才流动为例，探讨了中国与东南亚间的国际中文人才联合培养。<sup>[2]</sup>国际中文人才的培养与实践逐步成为比较教育研究关注的一项议题。有研究提出，在东盟发展战略从地区①经济合作转向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其地区内低程度和非均衡的学生流动不利于东盟共同体（ASEAN Community）建设，需要通过加强学历学位互认、质量保障等方法加以应对。<sup>[3]</sup>从区域发展战略转型的角度审视学生流动，具有研究视角与设计上的创新性。学校间交流合作则在区域教育合作中扮演基础性角色，相关研究更多关注高等教育层次的实践。例如，国外学者关注到中国老挝、马来西亚和泰国开设的三所大学海外分校是东南亚区域人员流动的一个关键平台，并指出海外分校在提升中国对东南亚文化软实力的同时，也受到中国软实力对学校课程设置与教学语言等方面的影响。<sup>[4]</sup>与高等学校层次的合作相比，中国与东盟基础教育层次的组织合作则缺乏研究投入。

其二，分析东盟和东南亚国家层面教育改革的新领域和新动态。2013年以来，国内学界对东盟和东南亚国家教育改革的关注度不断上升。例如，有关东盟教育地区化的研究指出，“东盟共同体建设以教育行动为契机，从顶层设计出发，相继出台一系列战略规划与行动纲领，以东盟教育部长领衔的平行组织架构，构建成员国教育体系的区域化协调关系”<sup>[5]</sup>；有学者探讨了新加坡的养老人才培养与养老模式；<sup>[6]</sup>有研究关注数字经济背景下越南的职业教育政策。<sup>[7]</sup>国外学界也对东盟和东南亚国家教育改革保持较高关注度，既有新加坡有关研究机构、学会和学术期刊等东南亚本土研究主体，也有美国和英国等英语学术界的研 究力量。国外学术界较多关注的议题有全球南北格局中柬埔寨学术人员的科研活动、<sup>[8]</sup>新加坡的教师问责制、<sup>[9]</sup>发达国家留学生教育对东南亚国家的公共外交及社会的影响<sup>[10]</sup>等等。

其三，聚焦区域或国别视域下教育合作制度和治理的研究。有研究指出，在考量东盟和美国对外战略的基础上，可通过培养高职技能人才、研制区域教师教育专业标准、推动学历学位互认深化中国与东盟的高等教育合作。<sup>[11]</sup>相关高等职业技能人才和教师教育等研究，回应了中国与东盟教育合作的核心关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是区域教育合作的支柱性平台，有学者以该平台为例，考察了中国与东盟制度性教育合作取得的成就。<sup>[12]</sup>另外，有研究关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跨域治理问题，指出其中存在“跨域治理结构松散、治理工具缺乏、优质资源分布不均”<sup>[13]</sup>等问题。职业教育层次的合作是中国与东盟教育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治理问题具有紧迫性。在具体国别教育合作方面，有研究关注到新加坡

的区域教育枢纽战略、<sup>[14]</sup>越南教育对外合作与投资、<sup>[15]</sup>柬埔寨高等教育治理<sup>[16]</sup>等议题。

以上综述表明，国内外学界对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研究呈现一定的上升势头，尤其是在政策动力和学界动力的推动下出现诸多新成果，集中在东盟组织、国家和学校等多个层面开展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立场升级对东盟教育问题的认识。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范围和影响不断扩大，并且在2021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施后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中国—东盟教育合作面临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家的战略性竞争，特别是美国以“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为抓手推进对东盟教育合作带来深刻影响。

基于上述文献分析和对有关实践的跟踪观察，本研究将中国—东盟教育合作分成人员、领域、治理三个维度的内容，其中人员进一步分为学生和教师。本研究中的教育合作是指上述三个维度的合作，不包括偶发性教育交流。从实践角度看，人员、领域、治理依次回答了谁在合作、合作什么和如何合作等核心问题。在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实践中，人员是核心，领域是依托，治理是保障。这三方面因素的组合构成了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立体化、交互式体系。

此外，需要对研究设计作出两点补充说明。其一，本研究主要基于“东盟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视角考察中国与东盟在教育合作中的需求和供给，以及东盟在开展国际教育合作中面临的挑战。这一视角在理念上强调从东盟的角度看待区域教育合作，在实践上将东盟引领的区域合作机制作为依托。该视角既回应了东盟中心地位国际认可度不断提升的事实，也考虑到从中国立场出发推进与东盟教育合作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其二，中国和东盟教育合作涉及区域多边合作、国别双边合作和次区域合作等层次，但因深化分析的必要性和篇幅所限，本研究集中在区域多边合作层次。对国别教育合作的分析也将向区域层次聚合，例如关注中国与多个东盟国家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合作。

## 二、“一带一路”倡议十年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成就

2013年以来，凭借区域秩序的稳定发展和多方行为体的共同协作，中国—东盟教育合作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质量明显提升，对区域教育发展需求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应答能力。

### （一）学生流动的主体性地位持续强化

学生跨境流动是中国—东盟最主要的教育合作类型之一。根据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发布的来华留学生数据<sup>①</sup>，2013—2018年东盟来华留学生总数超过48万人，并呈持



续上升趋势，其中学历生的数量从 3.19 万人增长至 4.90 万人，非学历生人数与学历生人数相近（见图 1）。其中，接受中国国家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人数从 2013 年的 5553 人上涨到 2018 年的 1.01 万人，增长率约 82%。2019 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东盟来华留学生数据缺失，调研发现，来华留学生整体规模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但从 2022 年下半年开始，来到中国继续或开始接受高等教育的东盟学生数量回升。<sup>①</sup>与此同时，东盟来华留学生的分布从集中在中国大城市和临近东南亚的区域转向多元化分布，来华留学生对中国高校国际化的整体促进作用进一步扩大。

单位：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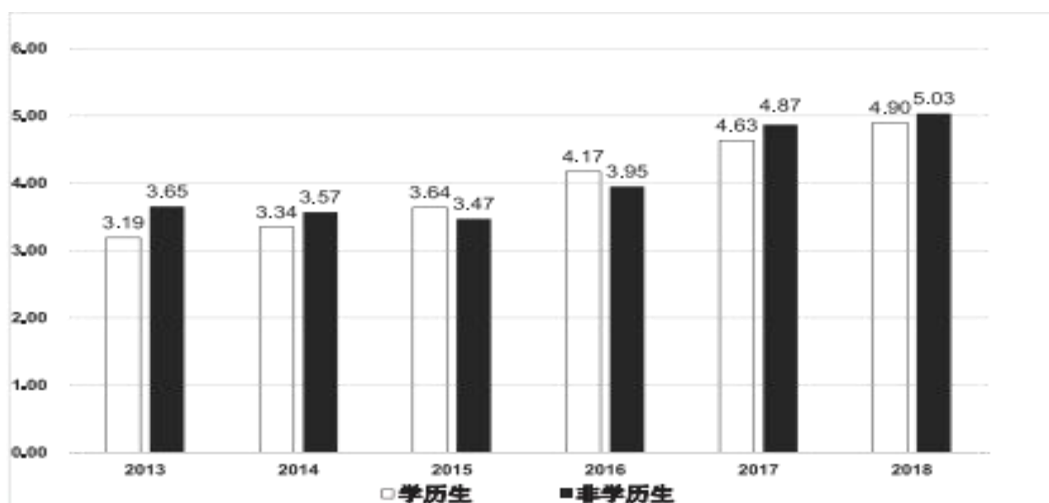


图1 东盟十国来华留学生统计（2013—2018年）

注：根据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2013—2018年发布的《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制作而成。

总体来看，经过多年资金和政策资源投入，中国—东盟的留学生教育合作实现质变，逐步走向中国与东盟全方位合作的中心位置。

## （二）教师流动取得优先性和战略性地位

2013年以来，中国—东盟教师流动取得了具有优先性和战略性的地位。其一，中国根据东盟国家需求派出国际中文教师。东盟国家是中国较早开始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重点区域，也是推动国际中文教育职业化转型的关键区域。据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原国家汉办发布的数据估算，2014—2020年，中国向东盟国家派出共计1.4万余名国际中文教师，规模最大时年派出2363名教师。如图2所示，东盟对国际中文教师的需求明显超过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等区域。

其二，中国依托跨境办学合作网络推进教师流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跨境合作办学网络虽然处于“低需求—低供给”的小规模发展状态，但是这类实践开拓了教师流动制度化合作渠道。如 2013 年以来，依托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华东师范大学马来西亚教育硕士教学点项目等开展的教师流动。

其三，中国高校教师到东盟国家访问和进修，主要去往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富集的东盟国家，如新加坡。同时，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东盟国家也逐渐成为中国高校教师出国短期进修和学历提升的目的地。凭借学习时间灵活、学习成本和毕业要求较低等条件，这些东盟国家的高校与中国高校开展频繁的教师合作，但也存在较为突出的质量隐患。如 2022 年发生了国内高校引进菲律宾“注水博士”的教育舆情。<sup>[17]</sup>

其四，东盟国家教师到中国接受专业发展培训，主要是在中国相关学校接受国际中文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机构是组织培训的主要力量，培训通常具有一定的教育援助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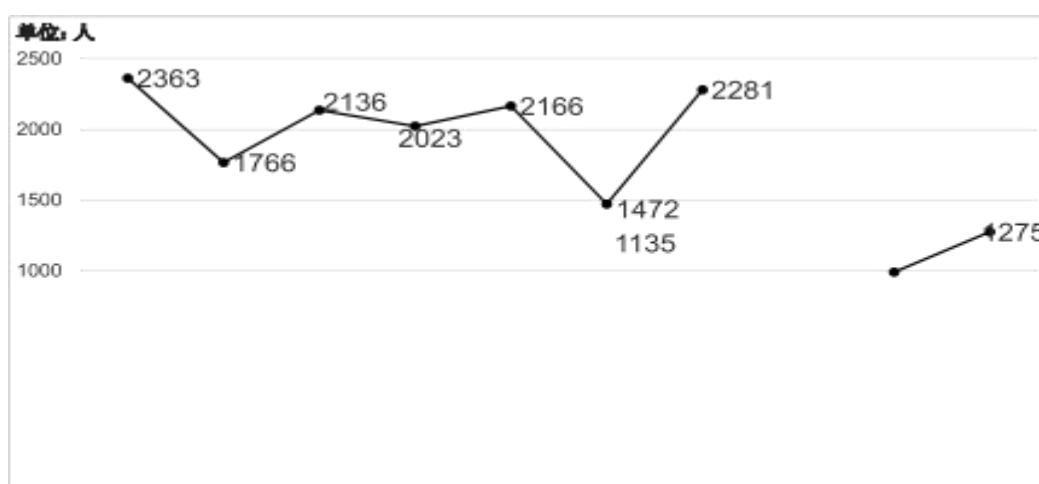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外派到东盟等区域的国际中文教师数量 (2014—2023 年)

注：根据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和原国家汉办发布的数据整理制作而成。其中 2014—2020 年数据来源于 <http://vct.hanban.org/>；2022 年和 2023 年数据来源于 <https://pmplatform.chinese.cn>。2021 年相关部门未发布相应数据。

### (三) 教育合作领域更加立体化和协同化

2013 年以来，中国和东盟的教育合作领域实现了更高水平的立体化和协同化发展。立体化指的是区域教育合作日益从传统领域延伸至非传统领域，如从过去简单的学生流动扩展至多所高校开设境外分校进行跨境合作办学。协同化指的是区域教育合作与经济、政治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相互协同与协作。因“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东盟各领域交流中形成的

互联互通集成效应，教育交流与经贸合作、科技创新和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相互赋能度持续上升。其一，中国—东盟依托“东盟+1”峰会及其配套交流机制，显著扩展了教育合作的领域，优化了教育合作的空间。例如，2019年发布的《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提出，通过中国—东盟青年领袖奖学金项目等旗舰计划推动区域教育、青年和人力资本等的协同发展。<sup>[18]</sup>其二，依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等教育类区域交流平台，扩展区域教育合作的层次和结构。其中，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促进构建了区域教育合作的多样化平台，将教育合作扩展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体育等多个领域。<sup>[19]</sup>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还创新办会模式，采用全年期项目提升中国与东盟教育合作的延展性。截至2022年，马来西亚吉隆坡和柔佛、老挝万象、柬埔寨金边、印度尼西亚泗水等已举办过交流周的全年期项目。其三，中国和东盟扩展教育合作领域时，十分重视回应全球发展新趋势，在科研创新与技术转化、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等时代性较强的领域打造合作连接点。例如，2018年《中国—东盟有关科技创新合作的联合声明》提出，双方将通过“中国—东盟科学技术联合委员会”等机制推进技术转化领域的合作，深化青年科学家交流。

#### （四）教育合作的治理体系持续优化

2013年以来，中国—东盟优化教育合作治理体系、提升区域教育治理能力的成就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双方依托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丰富教育合作治理体系的结构。2015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立副总理级别的人文交流机制，合作领域覆盖教育、科技、文化和青年等多个领域，成为中国与东盟教育合作的新增长点。<sup>[20]</sup>2016年，第二届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发布《关于中国—东盟教育合作行动计划支持东盟教育工作计划（2016—2020年）开展的联合公报》，2017年第十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通过《中国—东盟教育合作行动计划（2017—2020年）》，进一步完善了相关教育合作的治理体系，进而增强治理体系对区域教育合作的辐射能力。此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还重视将区域教育合作治理体系嵌入区域合作的各个方面，强化教育合作治理与区域合作的双向赋能。例如，2018年11月发布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提出将加强中国与东盟的教育创新和学术交流；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方愿同东盟加强职业教育、学历互认等合作”<sup>[21]</sup>，与东盟共建友好家园。

其二，借助“东盟+1”和“东盟+3”峰会等基于东盟中心地位的多边合作机制，提升教育合作治理体系的韧性。例如，2021年10月举办的中国—东盟峰会上，双方提出将建立教

育问题的高官会晤机制，引领教育合作的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在 2021 年召开的“东盟+3”教育部长会上，区域教育合作的协同化和多样化程度继续提升。相关声明指出，东盟将依托自身教育发展规划、“东盟+3”教育发展规划，借助东盟大学网络（ASEAN University Network）、东盟职业教育委员会（ASEAN TVET Council）等平台推进区域教育合作。<sup>[22]</sup>在东盟引领的区域合作机制下，中国与东盟的教育合作治理体系还辐射至更广领域。例如，2021 年《东盟+3 领导人关于青少年和儿童心理健康合作的声明》提出，中国将与东盟、日本和韩国加强有关心理健康的合作，在教育、儿童保护和家庭支持等领域推进合作。<sup>[23]</sup>中国—东盟还借助次区域合作框架丰富区域教育合作治理体系的层次，如澜湄国家次区域教育合作，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框架下的国别双边教育合作。

### 三、中国—东盟教育合作面临的挑战

#### （一）中国面临东盟教育合作需求增长与外部竞争加剧

随着东盟国家对中国教育合作需求增长，同时来自区域外国家和组织的竞争加剧，中国急需增强教育合作的供给能力。东盟国家留学生到中国主要接受高等教育，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一流高等教育供给，提升对东盟国家高层次来华留学生的吸引力。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开端期，中国面向东南亚的教育合作存在以非学历教育为主，欠缺学历教育合作，影响力和吸引力有限的弊端。<sup>[24]</su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指出，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东盟人口大国的留学生仍将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作为主要留学目的地。<sup>[25]</sup>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富集的国家持续推进和创新相关战略，吸引东盟国家的留学生和访问教师，中国—东盟教育合作因而面临更大竞争。此外，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基础教育合作也存在相似问题，如对陆地东南亚国家的跨境教育合作。相关研究指出，中国对缅甸籍边境学生提供的教育机会不足，这关系到边境教育生态和跨境教育共同体的建构。<sup>[26]</sup>新冠肺炎疫情前，中国边境区域有学校向缅甸、老挝等国的中小学生提供教育，但区域发展局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对相关教育合作造成较大影响。

中国面向区域教育合作的制度供给也需进一步强化。一是对接东盟教育发展的最新规划，推进宏观层面的制度供给和衔接。2022 年 11 月，东盟发布《东盟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宣言》，提出通过培训提升教师教学质量和数字化技能、在教学中实施数字化教学和形成性评价等改革举措来推进区域教育系统的数字化转型。<sup>[27]</sup>面对东盟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的宏观需求，中国教育系统需要更好对接其战略设计、回应其战略目标。二是更新迭代现有的教育合作制度与治理体系，提升中国—东盟教育合作制度的时代性和本土性。在宏观制度的框架

下，区域教育合作还需要丰富的制度来落实各层次各领域的教育合作，共同治理区域教育合作中面临的问题。例如，为推动中国和东盟在教师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高质量发展，相关改革需要在学生和教师流动、资金和资源出入境、跨境教育质量保障和学历学位互认等方面加大改革投入。与此同时，区域外国家的相关合作还对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生态构成冲击。在中国与东盟的区域教育合作系统中，以美国和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区域外国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2022年11月东盟与美国有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声明指出，美国将持续尊重东盟中心地位和主动对接东盟“印太展望”，加强对教育合作的投入以推进美国 and 东盟在次区域和区域层面的关系。<sup>[28]</sup>

## （二）东盟处在教育现代化转型与需求收缩的挑战期

2013—2023年，既是“一带一路”倡议起步和加速的关键期，也是东盟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尤其体现在扩展规模、调整结构和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等方面。东盟教育现代化发展面临需求收缩等挑战。其一，东盟国家在扩大教育发展规模、提升教育发展质量上的需求巨大，但高度差异化的需求对中国对接教育合作的能力提出挑战。新加坡、文莱这样体量小、资源足的东盟国家的教育现代化发展更加重视提升质量与公平；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中的东盟国家在增强质量的同时，仍需要继续做大教育发展的增量；柬埔寨、老挝、缅甸和东帝汶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在提升入学率、扩大教育规模等改革的过程中资源局限性更加突出。

其二，当前东盟紧跟全球教育发展新趋势，在教育公平、职业教育和数字化转型等领域加强投入。通过分析2013年以来历届东盟峰会的联合声明可以发现，东盟提升教育公平的主要议题包括：保护儿童的受教育权、消除青少年儿童遭受的各种霸凌、缩小男女受教育机会的差距等。欠缺职业技能人才一直是东盟经济社会发展乏力的一个主要原因。为此，东盟引领的教育改革十分重视职业教育改革中的制度建设和国际合作。例如，2020年东盟发布《在变化工作世界中发展人力资源的东盟宣言及其路线图》，在合作网络、能力建设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制定了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路线。与此同时，东盟积极开展与澳大利亚、美国 and 德国等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引入新的发展资源。此外，数字化转型是过去10年东盟教育系统改革最关注的领域之一，核心议题包括升级教育基础设施、增强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和发展学生数字素养。

其三，风险频发的全球形势下，东盟发展教育的短期需求收缩。在部分东盟国家政府换届发展交替，以及全球风险频发的背景下，东盟发展教育的需求相对收缩。新冠肺炎疫情对

东盟国家教育造成的冲击留下持续性影响，学生学习的损失、数字化教育教学的应用乃至生活习惯的转变，都是东盟教育现代化需要应对的新情况。这对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提出了新挑战。2020年以来，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相继出现政府换届，新加坡、印尼等国也处在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新政府需要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方挑战，对教育的投入出现相对下滑。根据东盟的统计数据，2019—2021年，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教育经费支出均逐年下降。<sup>[29]</sup>

### （三）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渠道数字化转型面临系统性挑战

中国—东盟教育合作面临渠道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性挑战。新生态要求对区域教育合作渠道更新迭代，在渠道结构、类型、连接和功效等维度都取得新突破。其一，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体量要求双方建设具有超强承载力的数字化渠道。中国与东盟教育合作中的人员流动具有超大规模性，如果在东盟中心地位的基础上将合作扩展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那么就要求中国与东盟在各阶段的教育合作中建立起高承载力的数字化渠道。

其二，东盟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差异要求打造具有结构多样的数字化渠道。差异性理解东盟教育数字化发展的一把钥匙。这种差异可以划分为发展基础、制度体系、资源与能力和未来目标等多个方面。例如，新加坡在教育数字化发展上拥有更好的基础，而印度尼西亚在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中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地区发展差距。中国对东盟的教育合作处于“一对多”的状态，需要创新数字化渠道建设来对接东盟国家的差异化需求，尤其需要考虑区域教育合作中统一性与多样性、发展需求与资源局限等矛盾。

其三，东盟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开放性要求建设能够包容其他合作方的数字化渠道。东盟作为一个后发地区，在对外合作中强调“趋利避害”，以开放性合作寻求更具韧性的发展。《东盟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宣言》指出，在东盟内部要建立更良好的生态式路径，畅通相关部门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上的合作渠道，加强体系内外的合作以提升数字化教育的互联互通。<sup>[30]</sup>中国在与东盟的对话合作中充分尊重其中心地位和主导的区域合作架构特征，相应的教育数字化渠道也需要作出及时回应。

其四，东盟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急切需求决定其渠道建设需要平衡好速度与质量。教育数字化发展越发成为东盟及其成员国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这在2022年的东盟峰会中有充分体现。中国与东盟的教育数字化合作渠道需要快速见效，对东盟自身的教育发展、东盟对外的教育合作发挥切实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对东盟教育数字化合作需要协调好教育、

数字化技术和经济社会建设等领域的发展规律。具体看，中国与东盟在国际留学生教育、国际教师流动、成果技术转化等方面的合作，不仅需要克服教育发展时间长、投入高的困难，而且需要及时推动技术迭代，为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培养大量人力资本。

#### **四、推动中国—东盟教育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东盟及其成员国在中国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和国际发展合作布局中居于要位。<sup>[31]</sup>伴随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的持续提质升级，推动区域教育合作的高质量发展符合双方长远利益诉求。未来可从人员、领域、治理体系三个方面推进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 **（一）对接区域教育合作的新需求，推动学生流动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提升**

在中国和东盟各自的内部需求变化，区域层次新战略以及全球层次不确定性因素等影响下，中国与东盟教育合作中出现诸多新需求。学生主体的需求集中体现在出国留学选择上，包括留学目的地，所选学校的阶段、层次和专业等。高等教育层次的学生流动仍是中国—东盟教育合作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区域经贸合作的深化会刺激基础教育阶段的国际学生流动。东盟在发展职业教育方面的需求，也是学生流动中需要考虑的新影响因素。据此，中国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仍然需要持续吸引更多的东盟留学生，同时不断提升留学生教育质量。依托地理邻近性、奖学金政策优厚等条件，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第一个十年对东盟国家留学生的吸引力明显增强。但为回应东盟学生日益扩大的出国留学需求、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竞争，中国还需要继续提升对东盟留学生的吸引力。具体可依次在国家、省市、学校三个层面针对性地加强开展留学生教育的能力，如国家和省市相关政府的政策支持与保障能力、系统服务留学生生活和就业需求的能力、防范留学生教育工作舆情风险的能力等，学校尤其是高校及其院系在留学生培养各环节的服务能力。此外，要加强对中国学生到东盟国家留学的支持力度。中国留学生出国目的地过度集中在英美国家会造成结构性风险，不利于中国高等教育以及整个教育对外开放的有序健康发展。<sup>[32]</sup>鼓励和支持中国学生到东盟国家留学，可直接扩展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范围和结构，同时有助于培养更多熟知中国和东盟区域发展的人才。

##### **（二）定位区域教育合作的新结构，打造层次多样、供给充足的教师队伍**

区域教育合作是与经贸往来、政治互信和人文交流等实践紧密嵌套的合作。区域教育合作的新发展结构需要建立新的教师队伍。如上文所述，中国—东盟教育合作中现已具备多种类型的教师流动，相应的教师队伍建设具有较好的多样性。但如果系统性分析区域内各国教

育系统的变革（特别是数字化转型）、区域经贸合作等领域日新月异的结构变化，有关学校需要深化教师队伍的改革和发展。具体来说，可以按照优先性将打造层次多样、供给充足的教师队伍，其实践划分如下。其一，持续推进中国与东盟在国际中文教师队伍建设上的合作。东盟是中国推广国际中文教育最成功的地区之一，需要保持领先优势，同时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其教师队伍从“语言+”向“职业+”的转型，从初级数字化向中高级数字化的转型。其二，增强中国各级各类学校面向东盟国家教师队伍的合作能力，对接东盟国家教师队伍转型的新需求。中国相关学校需要增强针对性服务能力，在现有实践的基础上继续扩大服务东盟国家建设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阶段教师队伍的需求。其三，探索中国—东盟教师教育合作的机制，保障双向教师教育合作的可持续发展。相关方可在现行框架下继续探索教师教育合作的机制，发挥大中小学的积极性、灵活性和非官方性，发展出更加多样和可持续的教师教育合作项目。

### **（三）扩展区域教育合作的新领域，建立更具韧性的教育合作体系**

从中国—东盟全面战略合作的目标和区域教育合作的实然状况看，未来可以继续扩展教育合作的领域，提升区域教育合作的韧性。通过扩展教育合作空间来提升韧性，遵循系统演化的多样性与稳健性逻辑。换言之，合作领域的覆盖性和纵深度越高，在面对冲击时的韧性就越强。具体可从如下方面推动相关合作。其一，在核心的区域层次内围绕回应中国和东盟优先战略需求的领域加强合作。在区域教育合作中，弥补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学习损失、推动教育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发展社会导向的职业教育等，都是符合双方战略对接需求的重要领域。其二，用好区域合作基础深化国别层次的合作。中国学校、政府等相关方可充分利用中国与东盟区域教育合作在人员流动、合作领域、制度与治理体系方面的基础性优势，根据国别需求和特征深化双边教育合作，并以国别合作反哺区域合作。其三，将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提升至全球层次，把握全球教育变革的新议题和新框架深化合作。中国是全球教育变革的主要力量，东盟国家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的帮助下积极对接全球教育发展战略。202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在教育公平、教学方法改革、知识共享、提升教育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推进教育领域的全球团结和国际合作等领域提出了诸多新倡议。<sup>[33]</sup>这些都是中国和东盟扩展教育合作领域时可以充分利用的共同关切和知识基础。

### **（四）长期优化区域教育合作制度，推动教育合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

在持续扩展教育合作领域的同时，还需要建立匹配的制度，以提供体系扩张所需的稳定



性。因此，为深化中国和东盟教育合作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推动教育合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其特殊性和普遍性，这在教育发展中也有相应体现。类似地，中国对东盟的教育合作实践与研究也需要尊重和秉持多样性理念，完善区域教育合作制度，推动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其一，在教育合作实践中尊重东盟中心地位，积极参与和维护东盟引领的区域合作架构中的教育合作。“东盟+”区域合作是中国与东盟教育合作的核心架构，未来的区域教育合作仍需要在此基础上丰富有关制度。其二，围绕区域教育合作的核心环节完善教育制度。在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区域教育合作是增进理解互信、培养国际人才、推进科研合作的关键战略，具有超大规模性、发展差异性、跨国性、竞合性等特征。未来需要在教育合作的各个领域加强相应的制度建设，协调各种特性造成的矛盾，推动区域教育合作系统的有序健康发展。其三，持续推进区域教育合作制度的守正创新，在现有基础上根据中国和东盟现代化发展的关联性推进治理体系建设，探索适应区域需求的创新性制度。

## 参考文献：

- [1] 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联合声明——面向和平、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EB/OL]. (2021-11-23) [2023-04-28]. [http://www.gov.cn/xinwen/2021-11/23/Content\\_5652616.htm](http://www.gov.cn/xinwen/2021-11/23/Content_5652616.htm).
- [2] 高皇伟，吴坚．“一带一路”倡议下东南亚汉语人才培养探析——以印度尼西亚亚洲国际友好学院为例 [J]．比较教育研究，2016, 38(12): 31-37.
- [3] CHAO R Y Jr. Mobility, mutual recognition and ASEAN community building: the road to sustainable ASEAN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17, 6(2): 105-121.
- [4] HE L, WILKINS S. The return of China's soft power in South East Asia: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 established by three Chinese universities[J]. *High Education Policy*, 2019, 32:321-327.
- [5] 尹雅丽，马早明．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教育行动路向——兼谈对我国推进区域化教育发展的启示 [J]．广西社会科学，2022(8): 62-71.
- [6] 林杰，刘业青．新加坡养老模式与高层次老年护理人才培养——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为例 [J]．比较教育研究，2022, 44(7): 66-76.
- [7] 刘琛．数字经济背景下越南职业教育政策分析 [J]．比较教育研究，2021, 43(10): 47-54.
- [8] HENG K, HAMID M O, KHAN A. Research engagement of academics in the Global South: the case of Cambodian academics[J].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2023, 21(3): 322-337.
- [9] HWA Y Y. 'Our system fits us': comparing teacher accountability, motivation, and sociocultural context in Finland and Singapore[J].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22, 58(4): 542-561.
- [10] TRAN L T, BUI H. Public diplomacy and social impact of Australian student mobility to the Indo-Pacific: host countries' perspectives on hosting new colombo plan students[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21, 25(4): 425-442.
- [11] 马早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策略选择 [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70-72.

- [12][19] 邵琪, 张义民.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 - 东盟教育交流合作回顾与展望——基于中国 - 东盟教育交流周的考察 [J]. 比较教育研究, 2022, 44(6): 57-64.
- [13] 张菊霞, 任洁华. 中国 - 东盟职业教育跨域治理的探索、挑战与机制 [J]. 中国高教研究, 2022(5): 95-101.
- [14] 廖青.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打造区域教育枢纽的比较研究 [J]. 比较教育研究, 2017, 39(11): 16-25.
- [15] 萧然. 越南《教育对外合作与投资法令》修订动向及其争议 [J]. 比较教育研究, 2022, 44(3): 104-112.
- [16] 杨文明. 柬埔寨高等教育治理模式演进研究 [J]. 比较教育研究, 2016, 38(4): 43-54.
- [17] 任冠青. 花两千万批量招“菲律宾博士”, 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EB/OL]. (2022-07-19) [2023-08-25]. [http://news.cyol.com/gb/articles/2022-07/19/content\\_V95PGuvB1.html](http://news.cyol.com/gb/articles/2022-07/19/content_V95PGuvB1.html).
- [18] ASEAN. ASEAN-China Joint Statement on Synergising the 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MPAC) 2025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EB/OL]. (2019-11-03) [2023-05-08].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Final-ASEAN-China-Joint-StatementSynergising-the-MPAC-2025-and-the-BRI.pdf>.
- [20] 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 第九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背景 [EB/OL]. (2016-08-03) [2023-08-25]. <https://jsj.moe.gov.cn/n2/7001/12107/827.shtml>. 习近平. 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 [EB/OL]. (2021-11-22) [2023-09-20]. [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111/t20211122\\_10451226.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111/t20211122_10451226.shtml).
- [22] ASEAN. Joint Statement of The Fifth ASEAN Plus Three Education Ministers Meeting [EB/OL]. (2021-10-01) [2023-05-08]. <https://aseanplusthree.asean.org/5th-apt-emm/>.
- [23] ASEAN. ASEAN Plus Three Leaders' Statement on Cooperation on Mental Health Amongst Adolescents and Young Children [EB/OL]. (2021-10-27) [2023-05-08].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89.-ASEAN-Plus-Three-Leaders-Statement-on-Cooperation-on-Mental-Health.pdf>.
- [24] 鲍东明, 曾晓洁, 张瑞芳. “一带一路”建设核心区对外开展教育交流合作情况调研报告 [J]. 比较教育研究, 2016, 38(12): 8-15+30.
- [25]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Global Flow of Tertiary Level Students [EB/OL]. (2023-08-22) [2023-08-22]. <http://uis.unesco.org/en/uis-student-flow>.
- [26] 王艳玲. 来华就读缅籍学生的边界认知与教育境遇: 来自云南边境区域的声音 [J]. 民族教育研究, 2019, 30(6): 85-92.
- [27][30] 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Systems in ASEAN [EB/OL]. (2022-11-11) [2023-05-08].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2/11/35-Declaration-on-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Education-Systems-in-ASEAN.pdf>.
- [28] ASEAN. ASEAN-U.S. Leaders' State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U.S.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EB/OL]. (2022-11-12) [2023-05-08]. <https://asean.org/asean-u-s-leaders-statement-on-the-establishment-of-the-asean-u-s-comprehensivestrategic-partnership/>.
- [29] ASEAN Stats Data Portal. [SDG.1.a.2] Proportion of total government spending on education (%) [EB/OL]. (2023-05-08) [2023-05-08]. <https://data.aseanstats.org/sdg>.
- [31] 杨体荣. 东南亚九国教育受援发展形态比较分析 [J]. 比较教育研究, 2022, 44(6): 64-74.
- [32] 蒋凯.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挑战与战略选择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0(12): 28-37.
- [33]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 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2: 4-5.

(本文来源: 比较教育研究 2023 年第 10 期)

# 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成效与展望（2013—2023）：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的视角

张 斌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流、社会文化、中国—东盟、礼仪学等）

**摘要：**随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稳步推进，中国与东盟的人文交流成效日渐显著，主要体现在多元化交流格局的形成、经常性交流平台和机制的建立、人文交流“重心”的逐步下移和一大批务实合作项目的实施等方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在中国与东盟朝着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不断升级的目标框架下，需要以“增信心”“聚众心”“筑同心”为目标，以聚焦重点工程合作、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打造命运与共的家园图景等为抓手，进一步深入开展中国—东盟人文交流，从而提升东盟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接受度、信任度和亲密度，为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夯实人文基础。

**关键词：**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人文交流；民心相通

2023年是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sup>[1]</sup>演讲的10周年。这10年来，中国与东盟相继提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重要论断与关键共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得到了中国与东盟的认可。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成效显著。“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sup>[2]</sup>民心相通是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实现与东盟互联互通的重要基石。习近平主席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指出：“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sup>[3]</sup>495 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而人文交流作为推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基础力量，则是推动“心联通”的重要路径。为此，梳理中国与东盟10年来的人文交流历程、回顾其做法和总结其经验成效，对探讨今后发力的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发展回顾

### （一）东盟的成立与发展

东盟（ASEAN），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的

简称，成立于1967年8月8日<sup>[4]</sup>。这一天，随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5个国家在泰国曼谷正式签署《曼谷宣言》，东南亚国家联盟宣告成立<sup>①</sup>。1984年1月7日文莱加入东盟；1995年7月28日越南加入东盟；1997年7月23日老挝和缅甸加入东盟；1999年4月30日柬埔寨加入东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共同构成了今日东盟的10个成员国<sup>①</sup>。东盟覆盖总面积约44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62亿人，东盟秘书处设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东盟峰会是东盟最高决策机构，由各成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组成，东盟各国轮流担任主席国。自1976年以来东盟共举行了41次峰会<sup>[4]</sup>。2008年12月，《东盟宪章》正式生效<sup>[4]</sup>，增强了东盟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方面的凝聚力，也增强了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分析，东盟的成立，即有其应对外部环境的考量，也有其维护民族独立和巩固政权、发展国家经济，以及维护战后东南亚地区安全等共同利益的考虑。从各成员国加入的时间和东盟的发展历程来看，东盟也是在不断探索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发展到现在，东盟已成为东南亚国家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注：①asean.org/about-us/https://asean.org/about-us/.）

## （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发展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首次提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要“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sup>[1]</sup>。2018年11月，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齐聚新加坡，通过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决定构建以政治安全、经济合作、社会文化为主线，多领域合作为支撑的合作新框架，打造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sup>[5]</sup>。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了题为《命运与共，共建家园》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创更加繁荣美好的地区和世界”的倡议<sup>[3]444</sup>。

从2013年提出与东盟“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到2018年的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继而到2021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反映出中国与东盟互为合作伙伴的重要性。中国与东盟从2013年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发展成为“共建和平家园、共建安宁家园、共建繁荣家园、共建美丽家园、共建友好家园”<sup>[3]441-443</sup>的“像亲戚一样常来常往，重情义，讲信义，遇到喜事共庆贺，遇到难事互帮衬”<sup>[3]440</sup>的亲近关系，则是中国与东盟双方相互友好关系不断深化的结果，也反映了中国在国家层面对与东盟关系的美好愿景。

## 二、人文交流的界定和主要路径

### （一）关于新时代人文交流的界定问题

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于“人文交流”乃至“人文”的界定和理解各不相同。当前，国内政界和学术界在继承了中国自古以来对于人文的理解，并融合了国外学界的相关界定及内涵后，对于人文交流的概念界定和内涵外延也逐渐明朗。近年来，学界更是从不同的角度赋予了其不同的定义和内涵。据笔者梳理，我国用在对外关系中的人文交流，涵盖了其公民外交、文化外交、跨文化交流和人员交往等多层意思。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国在对外工作中所使用的“人文交流”概念，目前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可完全诠释的翻译词汇。我们在对外交流时基本统一采用“people-to-people exchanges”，在国际上指的是“人员交流”。把人文交流放在对外关系的语境中，强调的是以人员交流、思想交流、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的跨国交流现象，它包含的内容不仅是“人员交流”，还是“people-to-people exchanges”（人员交流）与“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流）等意义的叠加。因此，在对外表述时，如果只是单纯地将其翻译为“people-to-people exchanges”还是不够精准。这个翻译，忽略掉了人文交流的内涵，那就是人员交往的内核，更深层次的交流，即思想交流和情感交流。新时代的人文交流，范畴更广，甚至还包括了与政治和经济相关领域的人员交流。概而论之，就是来自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通过相互交往和交流，达到了解对方及其文化背景的目的<sup>[6]32</sup>。

### （二）人文交流的实践回顾

跨文化交流活动为人文交流外交功能的正常发挥提供了坚实基础。19世纪后，文化交流获得了欧洲国的强力推动，法国等西方国家较早地将人文交流服务于国家的对外交流；20世纪后，英国、德国、美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相继开展教育、慈善等人文交流活动；20世纪90年代后，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展开了角逐“安全高地”“经济高地”“人文高地”的竞争与博弈，人文交流成为各国青睐的外交新形式。

中国开展国际人文交流活动历史悠久且成效显著。如：唐代派遣高僧西游印度、对日本派遣遣唐使，明代又派遣郑和七下西洋，等等。这些对外交流，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分别将瓷器、丝绸和茶叶等传到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历届国家领导人都是人文外交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毛泽东善打比喻、自信轻松的外交风格凸显了人文精神；邓小平1979年访美的整个活动及细节都彰显了人文精神并率先垂范积极推动了中美人文外交；江泽民在对外关系中贯彻韬光养晦的方针，强调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做法，展示了其沉着风格的人文底蕴；胡锦涛是人文外交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常以书生式的

说理风格拓展柔性外交，在国际上尊享颇具亲和力的赞誉；而习近平主席更是人文交流的示范者和推崇者。无论是 2013 年 6 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与奥巴马举行的非正式会晤，还是 2013 年 10 月出访印度尼西亚时“入乡随俗”地换上当地的民族服装，都凸显了其略带清新风格和“接地气”的外交新风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于人文交流政策层面和实践活动的注重程度更凸显了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对于人文交流的重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关注点本身就是“人类”这个群体的“人”本身；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之一的“民心相通”，更是以人文交流为基本实践路径。

### （三）新时代人文交流的主要路径

人文交流又被称为非官方外交、人民外交、“第二轨道”外交和“非政府组织”外交等<sup>[7]</sup>，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与政府间的官方外交相对而言的。它一般突出以民间交流为载体，更偏向以各国民众相互之间进行的国际交流。因此，人文交流可以是政府主导的活动，也可以是民间或者说是不同国家民众之间自发的交流行为，在对外交往的语境中，也是一种外交模式。关于人文交流的路径，主要源自其实践的归纳。一开始，人文交流的路径主要集中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sup>[8]</sup>，随着人文交流实践的深入实施，学界理论的不断拓展，人文交流的主要路径呈现在更多的领域。常见的政党、卫生、农业、旅游、媒体、出版、公益慈善、航空、领事、司法等领域的交流，只要有人员往来的交流，都属于人文交流的活动，从学理上来看，都可以作为人文交流的探讨范畴。因此，在有些场合和文献表述中，以上所提到的各领域的人文交流活动，也可称为人文交流的主要路径或人文交流的主要领域<sup>[6]34</sup>。

## 三、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成效

10 年来，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在文化、体育、艺术、教育、广电影视、新闻媒体、旅游、科技、医疗卫生等各领域蓬勃发展，建立了经常性交流机制，搭建了一批交流合作平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双向交流活动，实施了一批合作项目，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

### （一）形成了多元化交流格局

首先，交流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在原有的文化、教育等领域深度交流的基础上，近年来又拓展了更多的交流领域，诸如妇女、残疾人等。在残疾人事业方面：从 2015 年起，在中国—东盟博览会框架下建立了残疾人事务合作机制，中国和东盟各国有关残疾人机构、团体、企业围绕残疾人事业开展了多方交流，并举办了残疾辅助器具展示、残疾人才艺展示等活动，展现双方在残疾人康复、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共同发展的广阔前景<sup>[9]</sup>。其次，交流的领域越

来越细，交流明显呈现出从粗放型向精细化、专业化、纵深化发展的特征。以文化交流为例：2006年以前，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文化交流虽然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对某个细分领域进行系统性纵深性的交流并不多见。2006年首届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的举办，就是把“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切入口，使得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文化领域的交流更聚焦。在这个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原来的“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在2012年进一步升级并更名为“中国—东盟文化论坛”。此后，中国与东盟各国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图书馆、艺术节信息共享等更多的专题和主题设置议题，使得探讨进一步向精细化、专业化、纵深化发展，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各国文化交流向纵深化发展。最后，交流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中国与东盟各国通过培训交流、艺术表演、体育赛事、旅游互访、合作办学、媒体联合采访、广电频道合作、青年联欢、缔结友好城市、减贫经验交流、智库对话等形式，让中国与东盟各国民众有了更多相互了解的机会<sup>[5]50</sup>，也增进了文明交流互鉴。

## （二）建立了经常性交流平台和机制

中国与东盟各国通过一系列活动，诸如以举办主题交流年、节庆展览、会议等形式，夯实了各领域交流平台的建设基础和机制保障。主题交流年是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共同商定、每年围绕热点领域举办贯穿全年的机制性的系列交流活动。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已先后举办了2014年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2016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年、2017年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年、2018年中国—东盟创新合作年、2019年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等系列活动，形成了年初在中国举办开幕式，年末在东盟轮值主题国举办闭幕式，全年各项活动分别在中国和东盟国家不同城市广泛开展的模式，使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人文交流呈现出热点不断、高潮迭起的局面。展会成为中国与东盟各国人文交流的新纽带。每年一届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围绕文化、教育、科技、旅游、卫生、体育、环保、广电等领域举办专题展示和论坛，成为了中国与东盟各国人文领域各界人士定期交流的平台。中国—东盟博览会还专门举办了文化展、动漫游戏展、旅游展，使重点领域的交流进一步向精细化、专业化、纵深化发展。中国—东盟卫生论坛、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减贫论坛、中国—东盟智库战略论坛、中国—东盟文化论坛等专题论坛每年或每隔两三年定期举办，形成了各领域稳定的人文交流机制。此外，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2016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2013年）、15周年（2018年），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建交纪念年份，也分别策划并举办了文艺演出、摄影展、电视片展演等，以及组织媒体采访、策划发行邮票等一系列纪念活动，不断掀起人文交流的高潮<sup>[6]51</sup>。

### （三）人文交流的“重心”逐步下移

一是体现在交流区域的“重心”逐步下移。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之初，中国与东盟各国人文交流活动主要在首都或大城市之间开展。21世纪初，众多省会城市逐渐参与其中。到2013年以后，更多的中小城市也开展了交流，双向交流的覆盖范围更广，这一现象从中国—东盟博览会各专题或主题的举办城市所在地的变化即可见一斑。2004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这标志着我国中西部省会城市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成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重要舞台。中国—东盟博览会专门设立“魅力之城”专题，由中国和东盟10国各选出一个代表性城市作为本国“魅力之城”参展，开展旅游、文化等方面交流。2009年以前，大部分国家均选择其首都、省会城市或大城市参展。比如，在中国，主要选择北京、上海、天津、深圳、苏州等城市；在东盟国家，参展的主要地有文莱的斯里巴加湾、柬埔寨的金边、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老挝的万象、缅甸的仰光、菲律宾的宿务、越南的河内等，几乎都是东盟国家的首都或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大城市。2013年后，东盟国家原来知名度较低的稍微偏远的省份、地区或城市也作为其本国“魅力之城”纷纷加入了参展交流行列，如柬埔寨的柏威夏省、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省、老挝的乌多姆赛省、越南的太原省，等等。他们的参与，增进了中国与东盟各国各地基层之间的相互了解。二是体现在交流主体的“重心”逐步下移。具体表现在越来越多的经常性交流活动在中国与东盟各国基层单位之间展开，参与交流的群体也从精英阶层向普通民众拓展。例如，在东兴、凭祥、靖西等中越边境城市举办的中越跨国边民大联欢活动中，中国与越南民众就是通过文艺晚会、海上国际龙舟赛、边境中学生文化体育交流、山歌会等进行深入交流。中国—东盟戏曲演唱会、中国—东盟友谊歌会等文艺活动和“中国—东盟国际马拉松赛”等，深受中国与东盟各国民众喜爱。民众的广泛参与，达到了增进中国与东盟各国边民友谊的目的<sup>[6]52</sup>。

### （四）实施了一大批务实合作项目

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东盟在人文领域实施了一大批合作项目。例如，在东盟国家设立中国文化中心、在中国境内设立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中国—东盟体育交流合作中心、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中国—东盟妇女培训中心、中国—东盟青少年培养基地等。这些项目的实施，对促进务实合作、培训交流、思想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促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以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为例，该中心设在广西南宁市，致力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技术对接，将一大批我国先进适用技术输送到东盟国家，帮助东盟国家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者提高科技水平。二是促进各领域培训交流。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依托中国各地高校组建了30个不同专业的培训中心，涵盖商务会



展、金融财税、传统医药、新能源、农业、电力等诸多领域，为东盟国家培训了一大批专业人才。中国—东盟妇女培训中心以东盟国家在华女留学生为培训对象，帮助东盟国家妇女提高创新创业能力。东盟青年干部培训班项目从2002年至2019年在广西已开办53期，为东盟各国培训了2000多名青年干部<sup>[10]</sup>。三是促进中国与东盟民众之间思想交流。依托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中国—东盟大学智库联盟等，中国与东盟各国专家和学者围绕热点议题开展智库对话和学术交流，为双方关系正向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例如，《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的制定，正是双方专家、学者依托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深入开展研讨交流的成果<sup>[6]53</sup>。

#### 四、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展望

笔者认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中国面向东盟的人文交流的任务和目的应是提升本国形象，提升东盟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和信任度，为促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夯实人文基础。在这个目标框架下，我们面向东盟的人文交流应以树立良好国际形象、提升国家文化影响力为中心而开展，以取得“增信心、聚众心、筑同心”的效果。

##### （一）以“增信心”为目标，聚焦重点工程合作，扩充东盟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接受度

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过程中，中国深化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我国在与东盟的合作方面，亦是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与东盟各国通过交往和交流，能够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部门、非政府部门组织、一般民众之间对各方文化、政策等的认知和理解，在此基础上推动各合作方形成共识，为共商共建共享打下基础。这样的合作方式，既能夯实东盟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可基础，扩充其对中国的接受度，又能夯实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助推“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在全方位推进与东盟国家的人文交流中，我国应加强一些战略性特殊领域、重点项目的交流与合作，以达到交朋友、结善缘、增信心的目的。首先，加强教育合作。教育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人文资源的重中之重，是民心相通的重点工程。一是通过构建合作开放的“双向互通、学历和论文互认”的双边人才培养体系，支持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境外互设学院办学，推动高校参与中国—东盟区域教育一体化建设，建设面向东盟的教育合作高地。二是通过积极开展党政人员、职业专业人员等各类教育培训，支持当地高等院校和华人华侨兴办的中文教育机构等办好跨境教育培训，积极推进跨境教育合作。其次，加强科技合作。科技合作是促进中国—东盟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是大力支持中国各地科研机构、高校和大型企业与东盟各国合作共建实验室或研究中心，通

过加强与东盟各国的“产学研”合作，构建跨境“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二是针对东盟国家亟须的技术、与东盟国家共建双边技术转移中心，打造面向东盟的区域创新中心等合作平台，加强中国—东盟科技创新合作。再次，加强医疗卫生合作。一是通过推进双方在传染病防治、妇幼保健、应急医疗救助等领域务实合作，强化双边及多边卫生应急和紧急医疗援助合作机制。二是依托中国长寿、生态等资源，推进跨境传统医药研发合作，推进中国—东盟中医药医疗合作工程。最后，推进跨境旅游合作。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跨境旅游是中国与东盟各国人文交流的重要渠道。一是利用中国西南中南地区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旅游资源丰富且互补性强的优势，充分发挥其“通道”作用，打造东、中、西三条跨境旅游线，形成构建中国—东盟东线、中线、西线旅游走廊。二是通过联合打造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品牌，开展“中国—东南亚国际民族风情游”项目；通过联合开发一批高质量的特色旅游产品等方式，共同合作开发一批世界级旅游品牌，丰富跨境跨国旅游产品供给。三是通过推进中越德天—板约跨国瀑布国际旅游合作区、友谊关国际旅游合作区、东兴—芒街国际旅游合作区建设，推进中越国际旅游合作区建设；通过打造边关喀斯特地貌山水和历史文化国际旅游长廊等，推进中老、中缅国际旅游合作，以夯实合作方跨境跨国旅游合作平台和机制。

## **（二）以“聚众心”为目标，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增添东盟国家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度**

近年来，我国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人文交流活动的开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缮中国在国际上展示自身形象方法和路径的不足。通过在各领域开展实实在在的合作交流活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在用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还应注重提升面向东盟的国际传播效能。一方面，要善于将中国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事例、为东盟国家民众所作的贡献表达出来。另一方面，要注重融通当今国际传播的规律和表达方式，尽快构建面向东盟的中国叙事体系，学会“中国立场，东盟表达”。首先，要提升面向东盟的表达能力。具体来说，就是在提升中国传播全球化表达能力的基础上，实现中国传播面向东盟的区域化表达。要遵循传播的规律，将中国传统的传播思维模式与国际传播模式接轨，提升中国面向东盟传播的艺术和水平。其次，要强化分众化表达，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在开展与东盟的人文交流时，尽可能做到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受众开展有针对性的交流。东盟有 10 个国家之多，其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均有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均衡，而语言表达、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更是复杂多样，有针对性地分众化表达可以更好提升国际传播的效能。为此，表达要贴近东盟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

语言习惯、思维方式、话语风格，确保我国所要表达之意能够被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国情的东盟受众正确、充分、全面地理解。最后，要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和水平。要选准在众多与东盟共同开展的活动中的故事素材，把故事讲精彩，让东盟国家民众更好地读懂中国，增添东盟国家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度。

### **（三）以“筑同心”为目标，打造命运与共的家园图景，增加东盟国家民众对中国的亲密度**

民心相通指的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之间通过充分沟通和交流，其不同思想、情感能得到对方的充分认可和接受，从而达到以真心换真心的效果。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人文交流，作为提升国家影响力和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已经被赋予了化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赤字的重要使命<sup>[6]43</sup>。被赋予了外交功能的人文交流，就是通过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搭建起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国家的民众之间的沟通路径，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认知。在我国倡议与东盟国家共建和平家园、共建安宁家园、共建繁荣家园、共建美丽家园和共建友好家园的目标框架下，中国与东盟的人文交流应更凸显亲和力和感召力，应更关注东盟国家民众“民心”所盼，应以追求东盟国家民众在文化上的理解和情感上的认同为方向，搭建与东盟国家民众的认知“同心圆”、情感“同心圈”，增添中国与东盟国家民众之间的亲密度，形成情感共同体、人文共同体<sup>[6]43</sup>，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心联通”建设夯实人文基础。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N]. 人民日报, 2013-10-04(2).
- [2]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592.
-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 [4] 外交部. 东南亚国家联盟[EB/OL]. (2023-04) [2023-08-03].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518/jbqk\\_682520/](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518/jbqk_682520/).
- [5] 中国政府网.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EB/OL]. (2018-11-15) [2023-06-20]. [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8-11/15/content-t\\_5340677.htm](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8-11/15/content-t_5340677.htm).
- [6] 张斌. 公共外交视域下的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7] 赵可金.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理论基础、实践框架和评估体系[J]. 当代世界, 2019(5): 36-41.
- [8] 王亚军. 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固本强基[J]. 行政管理改革, 2019(3): 12-17.
- [9] 庞革平. 中国—东盟残疾人论坛: 为残疾人事务搭建重要对话与交流平台[EB/OL]. (2015-08-27) [2023-04-03].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827/c1002-27525399.html>.
-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这是充满希望的土地”: 老挝青年干部在桂见闻[EB/OL]. (2019-04-09) [2023-04-07]. [http://www.gxzf.gov.cn/gxydm/whjl\\_29790/t1220840.shtml](http://www.gxzf.gov.cn/gxydm/whjl_29790/t1220840.shtml).

**（本文来源：东南亚问题研究）**

## ◎热点分析

### 周边外交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卢光盛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常务理事)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的重大部署。”作为全方位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 周边外交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

#### 一、周边外交新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诠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工作, 于2013年10月召开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中国周边外交基本方针时, 首次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 ②为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

#### (一) “亲诚惠容”理念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方针的新发展与新要求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 周边外交一直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 “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 视促进周边和平、稳定、发展为己任”。进入21世纪, 在周边外交工作全面、深入的推进过程中, 系统的周边外交基本方针逐步成型。2002年11月,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2003年10月, 温家宝总理在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提出“睦邻、安邻、富邻”。

“亲诚惠容”是对“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继承、凝炼、升华与发展。“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侧重理念原则, “睦邻、安邻、富邻”侧重方式方法, “亲诚惠容”则兼及理念原则与方式方法。“亲”在理念原则上强调“睦邻友好, 守望相助”, 在方式方法上提出“多走动, 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 “诚”在理念原则上强调“诚心诚意”, 在方式方法上提出“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 “惠”在理念原则上强调“互惠互利”与“利益融合”, 在方式方法上提出“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 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

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容”在理念原则上强调“包容”，在方式方法上提出“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②“亲诚惠容”有体有用，使得中国周边外交所依循的一系列思想、理念、方针、政策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基本方针。

## **（二）“亲诚惠容”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2013年，可以被视为习近平外交思想成型过程中的一个“大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正确义利观、“一带一路”倡议、“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等一系列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原则、目标、方针和路径。这些思想和构想，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序列性，在逻辑上则是“吾道一以贯之”的一脉相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这一系列思想和构想的统领，也即“道”之所在。

“亲诚惠容”理念也与这一系列思想和构想相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中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亲”体现了建成“和睦的大家庭”的理念，它一方面强调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式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强调了周边外交工作的指向，即建立和睦的“亲”缘关系。“诚”强调了肝胆相照下的和谐共生，也就是“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惠”致力于“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倡导中国与周边国家错位协同、互惠共赢。“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道破了“容”的客观状态，客观决定主观，在外交实践中我们应当秉持包容的理念与态度。

## **二、新时代周边外交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体两面。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周边外交，事实上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一个重要环节。

### **（一）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落脚点**

长期以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始终坚持的外交政策宗旨。进入新时代，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核心目标与任务。在外交实践中，基

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中国面向不同的对象先后提出了多个国与国间双边命运共同体和区域性命运共同体。在双边层面，中国同老挝、柬埔寨、泰国、印尼、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明确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在区域层面，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先后提出，部分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早期成果。在全球层面，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统领下先后提出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等领域性命运共同体。

无论在地域上的双边层面还是区域层面，这些命运共同体总体上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集中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二是主要面向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两大特点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外交工作总体布局中的“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在面向周边、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中，构建多形式、层次的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1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一系列周边性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主轴。以作为中国周边外交优先方向的东南亚为例，在2013年10月赴印尼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1次领导人会议并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便提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21年11月，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以共建“五大家园”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 **(二)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一步**

在地域层面的一系列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建设围绕中国周边地区展开，事实上是客观存在和具体的、历史的客观实践决定的，也即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规律所决定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是中国的周边，中国也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周边，互为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客观上在地缘、文缘、人缘上存在“剪不断”的“亲”缘关系，在具体的、历史的客观实践中本身已经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一系列周边性命运共同体相较于其他地域层面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换句话说，在“有”这个层面，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事实上已经达成了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个事实。

当然，在全球化的时代，全人类在“有”这个层面事实上都已经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只不过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在“有”这个层次更为凸显、更为“强”，已经走到了从“有”到“好”的门槛之上。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中老、中柬、中印尼、澜湄国家、中国—东盟、上合组织等一系列周边性命运共同体，事实上指的是构建一个“好”的命运共同体。这

个“好”，就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中国在发展对外关系中面向部分国家和地区提出建设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就是认可在“有”这个层次与之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反之亦然。周边命运共同体在“有”这个层次可以说是具有最高水平的命运共同体之一，是最具有条件率先建成“好”的命运共同体的区域性命运共同体之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先行先试意义。从地域上讲，周边命运共同体也是衔接国与国间的双边命运共同体及跨区域性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中间环节。

### **三、“三大全球倡议”是新征程上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指南**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强调的是从“有”到“好”的建设过程，“一带一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建设平台，“三大全球倡议”则为“好”的建设提供了“施工蓝图”。

#### **(一)“三大全球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支柱，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指南**

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以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在实践中，中国人民及一切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国人民，对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与认识也在不断地优化与深化。面对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这“三大全球倡议”，以高度的全人类关怀先后回答了“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怎样实现全球发展”“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怎样实现普遍安全”“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文明理念、怎样实现交流互鉴”，为全世界贡献了新的高质量国际公共产品。

“三大全球倡议”本质上都是在高度体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人类如何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实践中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行的深刻回答，其首要关切是人类社会发展，指向的是可持续的“好”的生存与发展。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发展和安全的联结最终指向的是文明的现代化，也即“好”的人类社会发展。“三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实践指明了具体的前进方向与蓝图方案，也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分进程、子环节提供了新的指南。

#### **(二)中国周边是落实“三大全球倡议”最具条件的地区，宜成为“三大全球倡议”落地的先行试验区**

“三大全球倡议”指向的是“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而中国周边地区是最具条件建设“好”的命運共同体的地区，事实上也就是最具条件落实“三大全球倡议”的地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已普遍建立起良好的政策沟通机制，与东南亚国家已初步实现了发展战略对接、合作规范融合和发展规划协同，以东南亚、中亚为代表的中国周边地区有望成为落实“三大全球倡议”的先行示范区。从发展角度讲，“亲诚惠容”的“惠”已经借助“一带一路”和一系列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表现得较为明显，“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使中国发展红利惠及周边的同时，也使周边的发展反向惠及了中国，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初步实现了互惠互利、携手发展的格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东盟在2020年首次实现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调整，高水平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有望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基石，地区发展有望成为全球发展的先导。

从安全角度讲，传统安全问题迎来冷战后一个新的高发时间点，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渗透到世界各个领域。相较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中国及周边地区在传统安全方面实现了风险总体可控，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实现了较高水平的风险防范与协调应对，业已实现初步的普遍安全、共同安全。在新冠疫情的早期冲击中，中国与周边国家取得了较好的携手抗疫成果，展现出了高度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从文明角度讲，中国及周边地区在携手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文明交流互鉴氛围，丝路精神也伴随“一带一路”建设在中国周边国家逐步获得认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文明成果在周边地区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中国及周边地区已携手同行在现代化之路上。（本文来源：《南洋问题研究》2023年第2期，第18—20页。）